



于子元

鲁西南农运的先驱

成百上千的党员。在抗战中,他以非凡的胆量多次深入险境,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。而当新中国建立后,他淡泊名利,在教育岗位上踏踏实实继续为党工作……他,就是传奇英雄于子元。



寒门男儿 投身革命

于子元,原名于伯文,曾用名姜振声、姜泽民,1911年1月27日出生在今河南省范县木斯庄一个雇农家庭里。家里租了地主七亩地,农闲时父亲走乡串户做小本买卖,挣钱买些油盐柴米,勉强维持全家人的吃饭穿衣。

于子元的父亲为人正直,性情刚强。他吃尽了做生意不识字的苦头,克服经济困难供儿子读书。在于子元10岁那年,伯祖母听说孙子要去上学,高兴得连夜缝了一个书包,亲自把他送到邻村私塾学校。他没有辜负老人的期望,每天早起读书写字,晚上睡在被窝里背书,所以他的成绩在班内名列前茅。

因家庭贫寒,他们家常常遭受地主的欺负。在学校,他因为穿戴寒酸破烂,常常成为富家子弟取笑的柄,但他化讥笑为学习的动力。1931年10月,于子元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范县师范学校。

在学校里,他开始接触到革命的理论和新思想。其中,高一岁的学兄管守律正是地下共产党员。两人关系日渐亲密,管守律学问渊博,经常给他讲国家大事和革命真理,两人无话不谈。

渐渐地,于子元有了加入共产党的要求,为了考验他,管守律便布置给他一项任务:叫他寒假里在本村办农民夜校,通过组织贫苦农民学习文化,进行革命宣传。

寒假到了,于子元回到家办农民夜校。没有房子,他自己动手挖地窖;没有桌子,他搬来门板当课桌;没有课本,他自己掏钱买笔墨纸张,编写课本。夜校很快办起来了,全村30多个青年农民参加了夜校学习。于子元一面教农民识字,一面讲地主怎样剥削穷人,穷人为什么受穷等道理,揭露了社会的黑暗。通过短短20多天的夜校,农民增长了不少革命知识。

1932年3月14日晚上,管守律悄悄把于子元叫到学校的操场上,郑重地说:经过考验,我愿介绍你加入中国共产党,现组织上批准了你的申请。从今天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员了。今后你要严守党的机密,积极为党工作。于子元的心激动得快要跳出来,他郑重地宣誓:坚决跟党走,严守党的机密,服从纪律,牺牲个人,革命到底,永不叛党!

于子元入党不久,中共范县师范党支部正式成立。管守律为支部书记,毛延武为宣传委员,刘培岑为组织委员,于子元为二级班的党小组长。

在中共范县师范党支部的领导下,学校内的革命活动迅速开展起来。为了扩大与广大青年的联系,党支部决定成立公开的群众组织——读书会,团结了很多进步青年,甚至成功感化了曾是国民党员的贫苦青年丁连政,使其退出国民党,回来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。

能力出众 百折不挠

1934年10月初的一天早晨,于子元洗刷完毕,准备到学校餐厅吃早饭,刚走到半路,共产党员王继魁低沉而急促地告诉他:昨晚范县机关党员遭到大逮捕。刚刚县长带着护兵来学校找校长,怎么办?于子元机警地看了看校长室,校长牛润亭皱着眉头正从窗口探望。于子元看校长的脸色不好,说:快,从后门走!他和王继魁一块机智地离开了学校。从此于子元隐蔽在亲戚家,做小买卖糊口。

1934年底,为寻找组织,于子元回到家乡,通过本村共产党员教师靳永先(刘晏春的爱人)接上组织关系。在接头地点彭楼集染房,共产党员刘晏春给他布置了以后的主要任务,继续领导濮县农村支部的工作。

1935年秋,于子元调任中共范县县委书记。为了便于开展党的工作,他到范县五区大诸潭当小学教师,发展了汤景秀、汤继文、汤继潭等入党。

1935年12月,刘晏春在濮县召开濮县、范县两县党的负责人会议,布置筹建游击队。同时准备利用今冬明春贫苦农民生活困难时期,开展分粮吃大户的斗争。对此与会同志开展了热烈讨论。

于子元建议说,他村有一叫赵振刚的大地主,为富不仁,欺压良善,家有500多亩地,其儿子是国民党二区区长,内兄是个大土匪。他家有钱有枪有粮,民愤很大。大家一致同意于子元的意见,准备首先拿此恶霸地主开刀。

于子元回到家,调查了解地主赵振刚家的详情。赵家高墙深院,前后两进院,并有坚固的新楼,赵何地睡觉,其子何时归家,随从人手枪支弹药及安置等等,他摸得一清二楚,绘制出图后汇报给了领导。

1936年正月的一个晚上,濮县游击队300余人进驻木斯庄。因是初建,游击队人多枪少,便将地主大院包围。二区队留在院外把守,三区队和四区队冲进院内,抓住赵振刚,搜出楼门上的钥匙,打开楼门,缴获了2支步枪,1支匣枪,手榴弹,还有现大洋、布匹、粮食等,游击队出师大捷。

隐身敌营 发展队伍

事隔不久,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派重兵对

于子元,1911年生,山东范县人,193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,1936年秋来到菏泽一带,开始了轰轰烈烈的“农运”工作,曾任考城县县长,冀鲁豫支队四大队长,中共鲁西南地委民运部长,菏泽县动委会主任、县大队长,冀鲁豫军区第三办事处主任等职务。1948年1月,根据上级党组织的安排调离鲁西南。

于子元来到菏泽一带从事革命十多年,是鲁西南农运的先驱。

濮、范两县进行清剿,赵振刚伺机报复。其子反动气焰更加嚣张,到处逮捕共产党人。刘培岑、毛延武等共产党员先后被捕入狱。看到刚刚建立的游击队被敌人压垮,一些共产党员被通缉,于子元难过万分。

为隐蔽他化名姜振声,经天津、北平到张家口,凭表兄介绍信,到宣化兵团当了二等兵。

于子元到了部队,看到战士手中的钢枪,有了从中拉出一支队伍的想法。他所处的是冯玉祥部下吕秀文的私人势力,里面不少亲信子弟等,难以下手。经好友介绍,他认识了一名外号“四瘸子”的副官。

“四瘸子”叫王喜太(又名王道平),住在张家口市内。此人头脑灵活且心有大志,尤其具备进步爱国的思想。两人见面后相见恨晚,

王喜太干脆将他挽留在张家口。后来,两人无话不谈,受于子元的影响,王喜太等人还加入了共产党。为了拥有共产党自己的革命武装,王喜太提出回到曹县老家。因为家中埋着枪支弹药哩!

开辟鲁西南 建立党组织

1936年9月,于子元从张家口返回濮县,找到了中共直南特委党组织负责人刘晏春,详细汇报了自己在外地工作的情况和今后打算。刘晏春同意派他到鲁西南开辟新的工作。

鲁西南地区比较偏僻,交通不便,消息闭塞。人称此处“鸡叫听三省(即河南、河北、山东),狗咬惊五县(即菏泽、曹县、东明、考城、长垣)”,又称“飞地”(系指本省本县境内有外省外县的土地及村庄)较多,过去有人在菏泽犯罪,躲到东明“飞地”去,往往使官府差役无可奈何。这一带的群众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,对政治很少过问。国民党对该地区农村的控制也比较薄弱,这对于共产党开展活动非常有利。

1936年10月,于子元受中共直南特委的派遣,头戴礼帽,身穿长衫,骑着自行车,风尘仆仆到鲁西南,住在谢庄他父亲的朋友家里。他首先与大傅庄的傅秀元取得联系,一方面筹划拉武装,一方面在大傅庄发展傅秀峰和傅金灿入党。于子元要求党员组织贫民互助会,团结贫佃农,互帮互助,提高贫苦农民的阶级觉悟,继续发展党的组织。

于子元以卖烟卷为掩护,走街串巷,在进步知识分子中物色发展对象。他了解到在韩集教书的程力夫思想进步,便主动接近他。在于子元的教育和培养下,程力夫于1936年12月加入了共产党。从此,于子元有了得力的助手。同时,于子元还在安陵集设立了地下联络站。

为了广泛与知识青年接触,于子元拿出写鸟字的独特艺术。他先给韩集小学的学生写字。他的字一笔一画都是鸟,龙飞凤舞,远看是字,近看是各色各样的鸟。这一下惊动了四面八方的群众,一些知识分子纷纷向于子元求字,于子元利用和他们谈话的机会,进行革命宣传。

于子元和程力夫的革命活动,引起了国民党韩集区党部的注意,派李乃元(国民党员)到学校任课,秘密监视他们。为摆脱国民党监视,程力夫花二十块大洋买来一窝蜜蜂。于子元以教程力夫养蜂为名,来学校研究工作。后来国民党的监视愈来愈严重,为更好地开展工作,程力夫推荐于子元到曹县四区古营集担任小学教师,后来程力夫也调到胡集小学。两人利用星期六见面,交流工作进展情况,制订工作计划。

“七七”事变后,国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。鲁西南一带在外地师生纷纷返回故乡。于子元和程力夫都及时与他们取得联系。他们在贫民互助会的基础上,建立了抗日救国互助会和村抗日自卫队。但是孤立分散的群众组织形不成拳头,难以对付日军的侵袭,必须联合起来。1938年初,于子元、程力夫、刘齐滨等分头到各村做思想工作。于子元派张耀汉专门做杨履谦领导的“联庄会”工作。“联庄会”主要活动在许寺和王浩屯一带,有枪80余支。经过一段艰苦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,团结争取了大多数会员。杨履谦愿意跟共产党团结抗日,其他各村的村自卫队也纷纷表示愿意建立统一的抗日组织。向所归一鲁西南抗日救国总会成立了,总部设在安陵集寇孟笔家中。总会下设中心村抗日救国会、村抗日救国会。大部分村救国会是由共产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担任的。同时,各村儿童团、妇女救国会、青年救国会纷纷建立起来,鲁西南的抗日救国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,党的组织也有了迅速扩大,为抗日根据地的开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
改造绿林武装 整编王喜太部

1936年底,于子元、傅秀元同王喜太按照在张家口的研究方案,在曹县一带拉起了武装。到1938年初,已发展成为一支有七八百人、数百支枪的队伍。但缺乏政治领导力量,思想工作薄弱,仍沿用绿林武装的方法,称兄道弟,江湖义气很浓。中共上级党组织为了改造这支队伍,决定派于子元去王部,加强思想政治工作

作,把这支武装引导到革命道路上来。同时要做好曹县另一支武装——魏公奇部的统战工作。于子元利用王喜太与魏公奇的关系,又经王喜太推荐,当了魏部的参谋长。为了协助于子元搞好统战工作,党组织又增派20余位党员到各部做中下层官兵的工作。至10月间,王喜太部已发展为一支千余人的队伍,有枪千余支,小炮2门,机枪数挺。

于子元和王喜太研究,由于于子元去黄河北找八路军一一五师联系,决定带领这支队伍编入八路军。于子元到黄河北内黄县,找到一一五师六八八团政委何柱成,向他详细汇报了王喜太部的情况,要求能迅速改编这支队伍。何柱成听了汇报,非常高兴,当即派了一名宣传干事,随于子元回王喜太部驻地,经王喜太同意将部队带到濮阳县桑村待命。王喜太到六八八团部向何柱成政委汇报情况,确定王喜太暂留六八八团,由营长鲍启祥和宣传科长赴王部做官兵的说服动员工作。这时,国民党专员丁树本又极力散布流言蜚语,造谣中伤,加之王喜太没能马上回部队,引起了下层官兵的怀疑,误以为王喜太被共产党扣押,八路军要收缴他们的枪支,一夜之间,部队哗变,仅剩下30多名骨干力量,其余全部逃跑。

王喜太听到消息后,难过万分,长叹一声说:几年的心血付之东流了!何柱成政委安慰他说:不要紧,有些人听信谣言,不明真相,跑了还是可以回来的,有这些骨干分子,相信你会很快把队伍发展壮大起来。王喜太到桑村把留下的骨干带到内黄县六八八团部,换上了崭新的军装,王喜太改名王道平。何柱成政委代表部队颁发了委任状,委任王道平为“陇海支队司令”,仍回原地区继续活动。后在于子元积极协助下,陇海支队很快发展壮大起来。

扎根群众中 战胜土伪顽

1938年10月,于子元被任命为考城县县长。他到任不久,中共中央根据统战工作的需要,电令撤销考城县政府,把考城县武装编入冀鲁豫支队第四大队,于子元任该大队队长。1939年7月,于子元任鲁西南地委民运部长兼菏泽县动委会主任。

于子元在担任菏泽县动委会主任期间,亲自组建了一支地方武装。这支武装一部是菏泽县城南一带村庄地方自卫队,还有一部分是争取过来的一个国民党副营长带的溃退散兵。在此基础上进行整顿和扩大,建立了菏泽县动委会基干大队。又从八路军三四四旅政治部调来李苏波,任该大队教导员,这支武装力量很快发展到400多人,编为三个连,成为菏泽县城南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。

菏泽县动委会于同年9月,重点协助李鸣亭建立了四区联防办事处,下设四个区(离明、青邱、长明、灵圣)。办事处成立后,首先举办了两期训练班,招收大批知识青年,约二三百人,培训结束时,大多数学员发展为中共党员,成为区、村的骨干力量。

为了巩固这块根据地,打击日、伪、顽、匪的骚扰,各区都成立了自卫队、常备队。四区联防办事处成立了联防大队,从每区各抽调20多支枪,加上冀鲁豫支队给的部分枪支,共300多人,枪250余支,有力地打击了日寇,保卫了根据地建设。

驳斥安天国 打击会道门

1939年,湾杨村的杨嗣孝、杨敬言等人组织了“忠义社”。他们从考城县二区小宋庄请来了卖油的会道门头子安天国,建立了反动会道门组织“红枪会”。安天国自称“活神仙”,上知天文,下晓地理,中知人事。他表面高唱“与共产党合作抗日”,暗中却强迫群众加入由其操纵的红枪会,谁不愿加入,就组织道徒到谁家吃拿净,迫使加入。在安的欺骗威逼下,红枪会组织逐渐蔓延到附近几个村庄,他们公开到各村设坛场,大肆活动。

为争取他们抗日,于子元几次到湾杨村给安天国谈话,安天国阳奉阴违。至1939年秋,安自认为羽毛丰满,暗中投靠了日军,并与汉奸顽杂相勾结,公开与抗日组织对抗。

10月一天,安天国通知道徒全部武装到安陵集戏台前秘密集合。于子元闻讯后,立即赶到地委所在地郭庙,向地委书记戴晓东汇报。地委分析认为:安天国最近一段态度强横,根本不提抗日救国的口号,高喊什么“谁侵犯了群众利益,我们就打谁”,实际上是与“有人出人,有钱出钱,共同抗日”的口号针锋相对的,他秘密召开会议,是与我为敌的信号,我们决不能退让,要争取时间,晓以大义,力争蒙蔽的群众转变。于子元主动要求去做工作。为安全起见,决定派两名警卫员一同前往。

于子元带着两名警卫员,火速赶到安陵集戏楼。安天国站在戏楼上正洋洋得意地讲话,下面道徒们光着脊梁、穿着兜肚,有的身背明晃晃的大刀,有的拿着步枪或长矛,于子元把一名警卫员留在门外,带着一名警卫员上楼。

安天国、杨嗣孝等人看到这个不速之客,一下惊呆了。安天国皮笑肉不笑地说:嘿,你咋来了。于子元镇静自若地答道:听说你们开会,我来参加,准备借机会说几句话。安天国借口阻挠说:我们红枪会开会,你就不要讲了吧!于子元单刀直入地问道:你们是不是共同抗日吗?我讲咱们如何团结起来,共同抗日的事业。安天国蛮横地说:我们开会,你不能讲!

于子元理直气壮地反问:难道你不主张共同抗日?安天国气急败坏地答道:凡是侵犯群众利益的我都反对,我三条路都不走!于子元反问:哪三条路?安天国声嘶力竭地吼道:我一不跟共产党,二不跟国民党,三不跟日本!于子元一一驳斥道:三条路都不走是假的。走是真的,但不知你要走哪条路?

争论中,安天国被于子元说得无言以对。参加会议的红枪会员,特别是被他欺骗逼迫参加的人,不由得出伸大拇指暗暗称赞。最后,于子元终于讲了话。

于子元慷慨陈词,讲解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,阐述了只有共产党的领导,才能赶走日本侵略者,才能真正保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。

不久,安天国原形毕露。他发动湾杨叛乱,捕杀革命干部,杀共产党员。人民子弟兵三打安天国,平息了叛乱。

英雄本色 中流砥柱

1940年秋后,鲁西南根据地进入最危急时期。主力部队撤回黄河以北休整,周围的土顽杂军如考城的马逢乐、民权的张盛大、曹县的王子奎、定陶的王子杰、菏泽的张志刚等,见革命武装势力单薄,便开始蚕食根据地,一直将地、县委机关压缩到刘岗、曹楼、伊庄等几个自然村内。

当时,于子元一面带短枪队坚守最东面的村子——曹路口,一面组织力量,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。他们展开了一场攻心战。于子元和张盛大会谈,张耀汉同马逢乐会谈,牛言明与菏泽,定陶顽军谈判,阐明共同团结起来,一致抗日的道理。经过于子元的争取,各路顽军对立情绪缓和下来,多数转变为“中立”,对保卫根据地的斗争,发挥了重大作用。

正如地委对于子元的鉴定中所说:于子元同志善于团结各界人士,共同抗战,使革命转危为安,敢挑重担,砥柱中流……!

1942年冬,根据地党政机关实行精兵简政,领导机构的人员下放,充实基层。地委认为于子元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,并对考城一带的情况较熟悉,确定派他再去考城县开辟根据地,任命其为考城县县长兼县大队长。

考城县一带陇海铁路沿线为敌占区。在敌占区内,有日军据点,有地主、土顽的武装,在东北部还有大股土匪。考城县虽小,但敌人的武装力量相当强大,要想在此站住脚,打开南北交通要塞,必须从北向南推进。

为了打开工作局面,他首先建立了县大队武装。开始时仅有几十支枪,经过几次战斗,缴获了敌人一部分枪支弹药,县大队的武装力量得到了一些充实和加强。接着地委又增派了几个有实践经验、有工作能力的干部,在于子元的领导下开展了分化瓦解敌伪军工作。他们很快与兰封县的伪军头目张效雨和一些伪据点建立了关系,创造了孤立日军、分化土顽、打击顽固派的有利条件。

考城县的日军与西端的土顽最为疯狂,经常出来抢粮抓人,打击破路屯粮的革命群众。10天破路,3次打仗,有时竟一天打几次仗。于子元根据此情况,加强政治攻势,制造矛盾,利用矛盾分化敌人。不久,又与东端的土顽建立了统战关系。日军和汉奸每次大扫荡,他们都能及时提供情报,使该县机关和县大队多次避免损失。当我们的干部和部队穿过敌占区时,这些人也起了一定的掩护作用。

1943年是个灾荒年,为了减轻群众负担,改善机关干部的生活,于子元带领全体干部沿堤开荒,种棉花和蓖麻,好一点的土地种粮食作物及蔬菜,并教育干部战士艰苦朴素,自力更生,密切了党群关系,渡过了难关。

于子